

流 与 社
存 命
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
现 状 和 展 望

●肖恩·麦克布赖德●

●伊利·艾贝尔●于贝尔·伯夫-梅里●埃勒比·马·埃孔佐●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克斯●谢尔盖·洛谢夫●穆赫塔尔·卢比斯●
●穆斯塔法·马斯穆迪●永井道雄●弗雷德·伊萨克·阿克波鲁亚罗·奥默●
●博格丹·奥索尔尼克●贾迈勒·奥泰菲●约翰内斯·皮耶特·普隆克●
●胡安·索马维亚●布波利·乔治·弗吉斯●
●贝蒂·齐默尔曼●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33.816
144

交流与社会
现状和展望

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

33.816 / 05

朝 向
更加公正、更加有效
的世界情报和交流的新秩序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北京·1981年

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 交流与社会 · 现状和展望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二编译室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3 1/2 印张 385千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70220·2 定价：1.70元

Original title:

MANY VOICES, ONE WORLD

*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UNESCO 1980

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

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编写的报告

委员会成员

肖恩·麦克布赖德(爱尔兰), 主席

伊利·艾贝尔(美国)

于贝尔·伯夫-梅里(法国)

埃勒比·马·埃孔佐(扎伊尔)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克斯(哥伦比亚)

谢尔盖·洛谢夫(苏联)

穆赫塔尔·卢比斯(印度尼西亚)

穆斯塔法·马斯穆迪(突尼斯)

永井道雄(日本)

弗雷德·伊萨克·阿克波瓦罗·奥默(尼日利亚)

博格丹·奥索尔尼克(南斯拉夫)

贾迈勒·奥泰菲(埃及)

约翰内斯·皮耶特·普隆克(荷兰)

胡安·索马维亚(智利)

布波利·乔治·弗吉斯(印度)

贝蒂·齐默尔曼(加拿大)

秘 书 处

成员:

阿谢尔·德莱翁, 执行秘书

皮埃尔·昂凯

艾哈迈德·凯塔尼

约翰·G. 梅西

威廉·西亚德

苏萨娜·多丁

达夫妮·穆莱特

希伊拉·德瓦莱

简·赖特

合作咨询人员:

弗朗西斯·巴勒

詹姆斯·哈洛伦

约翰·李

费尔南多·雷耶斯·马塔

德巴·维兰德

亚先·扎索乌尔斯基

主席的编辑顾问:

默文·琼斯

翻译:

约翰·克龙比

吉勒斯·菲利伯特

前 言

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交流是一切社会交往的实质。无论何时人们相互之间建立了正常关系，他们之间所出现的交流制度的性质、这些交流所采取的形式以及所达到的有效程度，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使各个社会彼此关系更为密切或者合为一体的各种可能性，并且决定了减缓紧张局势或者解决冲突的前景，不论这种紧张局势或者冲突在哪里出现。

在开始的时候，只有在限定的社会中，人们成群地比邻而居或是成为同一政治单位的组成部分，才有可能进行长期交流。而现在，由于新闻工具的工作速度，由于全世界普遍发展的各种关系网，已经形成了基本上是世界范围的交流了。

今后，除了特别难于进入的地区中极少数集团而外，人们不能离群索居。现在每一个国家对于其他国家都成为每日现实的一部分。尽管可能并未真正意识到全世界休戚相关，但是世界却继续变得愈来愈相互依存了。

不过，这种相互依存往往又同大量的不均衡现象联系在一起，有时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导致各种误解，并成为紧张局势的种种温床，所有这些使世界一直处于动乱之中。

诚然，统治格局和由此引起的利害冲突不可能仅仅因为交流范围的扩大而消失，但是，增加交流的可能性，通过使每个人更加注意别人的问题和抱负、以及使每个国家更加认识到整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危险，就可能有助于减轻上述影响。

在这些情况下，交流的重要性是基本的。并且，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满足这一需要的手段现在也已具备。卫星时代的大众

交流为各国人民提供了以下可能性，即能同时目睹同一事件，充分交换情报，尽管各有具体特点仍能增加相互了解，并在承认差别的同时相互尊重。

与此同时，交流工具正处于这样的过程中：改变各个国家内社会交流的基本资料、建立新的交换制度、完全改变支配知识传播的条件，开辟普及正规教育 and 非正规教育的一系列机会，给所有人们带来文化，增进知识和专门技术知识。交流工具正在创造条件，使个人得以不断丰富知识，使各国居民能够参与本国的进展，并且开阔视野使人们得以看到整个国际社会。

因此，设想当人们愈来愈感到他们的国家命运是密切相连的，今后他们就会寻求发展日益增长的友谊纽带，并且逐步建立基于相互尊重和合作的关系。这并不是痴心妄想。

不过，这些只是一个时代提供的某些前景，这个时代既能为将来创造最好的前景，同样也能够导致最坏的。以上前景只有在抵制诱惑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那种诱惑是使大众交流工具为狭隘的宗派利益所用并将它们变为新的权力工具，把对人类尊严的侮辱说成合理，并加重国家之间和各个国家内部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状况。并且，只有竭尽一切努力使大众交流工具趋于集中的倾向不致逐渐缩小个人与个人之间交流的范围，不致最终破坏个人能借以行使其表达自由的权利的多种多样的渠道，不论这些渠道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只有这样，以上前景才得以实现。

新闻工具会有助于在各方面为人类作为个人赢得尊重，尽管他们表现出多种差别，并且有助于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得到认可可以取代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新闻工具也能鼓励各个社会、各种文化和各个个人之间进行连续对话，目的在于促进机会均等和双向交流。这就首先要以各个领域的情报应该自由流通为先决条件。但是，我们应该始终断定，这种自由只有在对每个人都成为现实时才能充分有效。

教科文组织自根据其组织法成立以来，一直尽力创造这种条

件,组织法规定该组织努力从事“不受限制地寻求客观真理以及自由交流思想与知识……”,并为此目的,“增加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手段。”

不过,主要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随着大众交流工具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具有日益增加的重要性,随着人们日益认识到大众交流工具所应起的作用,尤其是在新独立国家的发展中所应起的作用,才敦促本组织对该问题作更深刻的思考并加强行动。本组织因而在把注意力集中于世界范围内和各个社会内需要更加均衡的情报流通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

正是有鉴于此,大会在1976年于内罗毕举行的第十九届会议上,责成我以技术进展和国际关系的最新发展为背景来审查当代社会交流的一切问题,并适当考虑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因此,在从事这项工作中,我认为建立一个由很有能力的、有各种不同经历的杰出人物组成的“智囊团”是可取的,我因而建立了以肖恩·麦克布赖德先生为主席的国家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包括下列委员:伊利·艾贝尔(美利坚合众国);于贝尔·伯夫-梅里(法国);埃勒比·马·埃孔佐(扎伊尔);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克斯(哥伦比亚);谢尔盖·洛谢夫(苏联);穆赫塔尔·卢比斯(印度尼西亚);穆斯塔法·马斯穆迪(突尼斯);永井道雄(日本);弗雷德·伊萨克·阿克波瓦罗·奥默(尼日利亚);博格丹·奥索尔尼克(南斯拉夫);贾迈勒·奥泰菲(埃及);约翰内斯·皮耶特·普隆克(荷兰);胡安·索马维亚(智利);布波利·乔治·弗吉斯(印度)和贝蒂·齐默尔曼(加拿大)。

该委员会立即接手此项任务。委员会从事对这些问题的调查活动和进行工作时,在条件和程序方面具有完全的学术思想自由和在可能范围内最广泛的言论行动自由。尽管该委员会可用来进行这样一项工作的时间很短,它还是成功地在两年内举行了八次会议,——一共两个月的工作时间,草拟了我在此谨向大家提交的这份最后报告。

请允许我乘此之际公开表示，我极为感谢麦克布赖德先生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他们来自各个地区和各种不同的专业岗位，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他们始终不渝地以思想上的正直和宽容精神，竭尽全力，集体处理范围特别广泛的一系列问题，并且阐明这些问题对当今世界的极为重要影响。

根据大会于1978年第二十届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关于交流工具的宣言所规定的原则，整个国际社会要作出努力，来实事求是地考虑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挑战和我们为应付这些挑战而可能一致行动的方式。因此，可以认为本报告是这种努力的头一个阶段。

考虑到当代社会的多样性，关于交流引起的各种问题并不是一份研究报告所能完全解决的，不论这份报告写得多么透彻全面。因此，该委员会的工作必须继续进行并进一步深入。

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本报告不仅要提供给负责交流的当局和各种理由与交流发展有关的各机构，而且要提供给所有研究部门的行政官员和研究工作者、非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各国的一般公众。本报告先用教科文组织审议机构的工作语文，即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文和中文出版，我们还要尽力协助用其他语文出版本报告。

重要的是，在一切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所有男男女女，都应当有机会参加由此开始的集体思考行列，因为必须使新思想得到发展，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以摆脱流行的惰性。随着新的世界交流秩序的来临，每一个民族一定能够向其他民族学习，并与此同时向其他民族传达自己对本民族情况的了解和对世界事务的观点。那时，人类就将在通向自由、民主和友谊的道路上迈出决定性的前进步伐。

序 言

肖恩·麦克布赖德

(主席)

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于1977年12月开始工作。当时我们在这交流领域的漫长历程刚刚开始，我既兴奋，又惶恐。兴奋的是我有机会主持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十六名成员组成的小组，探索对于和平和人类发展具有如此根本意义的一个问题。惶恐的是要研究的题目范围很广，而问题又棘手。

从建立本委员会的背景情况来看，也不容许我们采取任何轻率的乐观态度来预期今后任务将面临的困难或在达成一致结论方面会遇到的困难。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关于交流问题的国际辩论曾经在许多方面发展到了吵吵嚷嚷、发生对抗的地步。第三世界对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新闻在新闻流通中占据支配地位提出的抗议，往往被看作是对新闻自由流通的抨击。新闻自由的捍卫者则被说成是侵犯了国家主权。关于新闻价值准则的各种不同的观念以及新闻工作者的作用、权利和责任，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关于大众交流工具对于解决世界重大问题可能作出什么贡献，也是众说纷纭。

本委员会工作伊始就笼罩着这种不和的气氛，所以我从一开始便关心如何对当今的交流情况作一不偏不倚的、不受任何一方影响的、客观的分析，以及如何完成这样一个迫切要求解决的任务，即：就我们面前摆着的重大问题在观点上达成尽可能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

我主要关心的另一件事情是我们任务的广泛性：“对现代社会的全部交流问题进行研究”。本委员会在其工作过程中仔细阅读过

的有关本领域的一切文件和文献，其中没有一份曾试图作这种无所不包的审查。我们的报告并无意作为权威性的文件，但是我们试图超越常规的问题范围，使之接近于我们的工作职责。

因此，我们的报告不只是单纯的关于新闻的采集和传播或关于大众交流工具的报告，虽然这些方面的重大问题是讨论的起点。我们直接专心致志于从更广泛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学角度进行观察。同样地，集中于对情报的研究，就不得不把范围扩大到包括交流的一切方面，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全局来考虑。再者，由于交流无论对于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一切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占有如此主要的地位，我要引用一句 H. G. 韦尔斯的话：人类历史愈来愈成为一场交流和大灾难之间的竞赛了。要确保人类不只限于有一部过去的历史……还要确保我们的儿童有一个未来，充分地利用交流，把它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统统利用起来，便是十分重要的。

本委员会的十六名委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世界上的思想、政治、经济领域各界和各地域——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了我认为具有惊人程度的意见一致，而在此以前有关这些问题的意见似乎是不可调和的。这不仅仅是一个达成一些结论的问题；更重要的也许在于对这些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进行了鉴别和分析。我们希望这些对于有关发展新的世界情报和交流秩序的各个方面所要不可避免地继续进行的辩论会有所裨益。

对我说来——并且我冒昧认为，对本委员会所有我的同事说来也是如此——最有收获的体验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彼此之间相互尊重和友谊之情。我希望，在我们工作中占主要地位的那种建设性努力，在各国政府及其他有关方面审查我们的报告时，将会坚持下去。

当这份报告的定稿摆在我们面前等待批准的时候，我不由产生一种要把它从头到尾重写一遍的愿望，我相信所有我的同事和秘书处的成员都同样会有这种情不自禁的想法。报告的文风前后各异，有的部分过于冗长。且不说我们缺乏从事这项工作所必需的时间，

我觉得，这份报告尽管文体上不完美，但把我们的观点还是表达得很清楚的。这份关于交流的巨著是由许许多多语言的、文化的以及哲学的线索穿插其间交织而成的，读者诸君务请在阅读时留意这些线索。

尽管在大多数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广泛的协商一致，但显然有许多问题仍有待于探索、解决；并且，还有许多题目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在组织和执行有助于建设新的秩序的、需要不断加以检查的具体措施方面，困难更多。关于“新秩序”的含义和关于这个新秩序应该包含些什么内容，是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的，正如在实现这个新秩序的方式方法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一样。但尽管有这些分歧，本委员会里每个人无不坚定认为必须进行交流领域的结构改革，无不认为现存秩序是无法为大家所接受的。

对于现有的错综复杂而又相互联系的交流问题，显然并没有一蹴而就的奇迹般的解决办法。在耐心地逐步建立所需要的新的结构、方法和态度的过程中，有许多阶段、战略和方面。因此，“新的世界情报和交流秩序”与其说是有什么特定的一整套条件和做法，倒不如说是一个过程可能更为确切。这一过程的细节将不断变化，但目标则是不变的——即情报交流中要有更多的正义、更多的公平、更多的互惠，交流流通中要减少依赖、减少自上而下传播信息、增加自力更生和文化特性、为全人类谋更多的福利。

本委员会关于发展一个新的世界情报与交流秩序的主要指导方针的分析和协商一致意见，本身就是一个经历漫长过程才产生的结果。我们应该多谢穆斯塔法·马斯穆迪大使和博格丹·奥索尔尼克博士，不仅是因为他们坚持不懈地提倡“新秩序”，还因为他们建设性地阐明了新秩序的主要方面。但除了从1977年12月到1979年11月期间先后举行的八次会议上本委员会的各位成员间作过内容丰富多采的讨论外，我们的基本做法是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经常同外界接触，直接同代表着国家、地区和国际各级参与其事的有关专业

人员和专家一起审查广泛的题目。

我们一开始就着手组织一次大的国际集会，以便共同讨论例如新闻的内容、描述的事实和形象的准确性和均衡性、新闻供应的基础结构、新闻工作者和从事新闻采集和发送的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其业务的技术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为此目的，于1978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了新闻采集和传播的基础结构的国际研究班，由瑞典政府慷慨支助，参加者有大约100名代表，他们来自通讯社、广播组织、各大报社、研究机构以及世界性和地区性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除在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的会议外，本委员会还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如瑞典、南斯拉夫、印度和墨西哥举行过四次会议。这才能对有关的各种根本不同的文化及社会问题更深入的了解，也才能同对在大相径庭的社会里交流的基本方面持有不同观点的专业人员和研究工作者进行接触。对于本委员会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题目则组织圆桌会议进行讨论：我们同南斯拉夫交流机构和政府方面的代表讨论了社会和交流工具的相互作用；我们还同他们在这次圆桌会议上讨论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问题。我们的印度东道主组织了一次关于交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范围广泛的讨论；我们还同他们讨论了未来技术进步的影响问题。我们同一大批拉丁美洲的作家、教授和从事交流工作的人员集中讨论了文化和交流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些就中心主题进行的直接磋商，使我们对交流的一些根本问题的连锁性质获得了非常宝贵的见识；特别是，这些磋商肯定了这些问题是同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格局在结构上连结在一起的。因此，归根结蒂——而且不可避免地——交流问题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问题今天成为国家和国际舞台中心的基本原因。

供我们考虑的进一步的背景材料是由世界各地的专家们就交流的具体方面撰写的叙述性和意见性文件约一百份左右所提供的。这

就为进行比较分析和促使对某些交流问题进行重新考虑提供了特别有价值的实质性材料。

由于我本人和本委员会及秘书处的其他成员有机会参加由同新闻和交流各个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国际专业协会、不结盟国家、区域和国家机构组织的几十次会议、会见、专题讨论会和讨论小组，这就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在专业上同各方面的接触。

此外，在本委员会工作过程中，几十个国际的、区域的和国家的机构——研究和文献中心、新闻学校、大学、专业协会和类似机构——通过慷慨提供研究成果、专题文献和实质性评论积极进行了协作。

最后，我们收到了个人、机构和政府方面对我们1978年提交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届会议的临时报告所提出的几百条评论意见，使我们受益匪浅。

因此，我们的报告，一方面代表本委员会对交流状况的集体看法，同时也是以实际上是世界范围的意见调查（包括个人的和机构的意见）和来自无数来源的浩瀚文献为基础的。这一大批资料极为广泛地包括了各色各样的思想、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色彩。本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根据他或她自己的观点考虑了这些资料，然后在我们进行审议时对这些资料加以集体审查。

经过去粗取精，写出了这篇报告，总的说来，这是本委员会关于如何看待当前的交流秩序和怎样预见一个新的交流秩序的协商一致意见。凡有分歧之处，皆以评论或提出异议的方式予以反映。但是这个报告是有广泛的基础的，加之，它又是由一个有代表性的国际小组即本委员会撰写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报告——它的陈述、调查结论和建议——将会有众多的知音。由于有了这种信念，我开初的那种惶恐心情便顿时消失了。我深信，有良好的意愿统率着未来的对话，一个有益于全人类的新秩序是能够建立起来的。

目 录

	页次
前 言	xv
序 言	xix
第一部分 交流与社会	
第一章 历史方面	3
1. 尚未消逝的过去	3
2. 现状的由来	8
3. 未来在孕育中	14
第二章 当代情势方面	19
1. 交流的功能	19
2. 一种社会需要	22
3. 一种政治工具	25
4. 一股经济力量	33
5. 一种教育潜力	36
6. 对文化的推动和威胁	42
7. 技术所引起的矛盾	44
第三章 国际方面	47
1. 问题之所在	47
2. 不平衡现象和不平等现象	49
3. 国际辩论	51
4. 向世界开放的讲坛：教科文组织	55
	vii